

# 中国老年人口同居问题研究

张翼

**【摘要】**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同居现象越来越普遍。但老年同居与青年、中年同居不同,在老年单身男性和女性中,低收入人群的同居发生比高于高收入人群。在城镇化与迁居化的影响下,老年人口在“空巢”之后的独居,必然产生照料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老年单身男性“需要照料”的人群同居发生比较高;老年单身女性中,农业户籍比非农户籍的同居发生比高。另外,老年单身男性的成年儿子越多,越易于形成同居格局;老年单身女性的成年女儿越多,形成同居格局的概率越低。

**【关键词】**同居 老年同居 单身老人 个体化社会

**【作者】**张翼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现代化将人类生活的最小单元越来越多地由“家”向“户”转变<sup>①</sup>,并在保持原有家庭结构的同时,衍生出户结构共同体(王跃生,2016)。而其中最常见的增长点集中在具有泛家庭意义或类家庭意义的“同居”上。事实上,在以居住单元为载体的生活共同体结构中,“同居”数量及其占比的增长最具代表意义。家庭社会学领域的某些相关研究将“同居”归类为家庭现代化的某种变形。对于“同居者”来说,有些人自己认同为“家庭成员”,并以“家庭成员”的名义互相指称,这实际是以家庭概念“符号化”自己和同居方。有些婚前同居者经常将自己的角色在男朋友(女朋友)和丈夫(妻子)之间转化。但实际上,即使是稳定的同居关系,其中蕴含的法律角色内涵也不同于基于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而形成的家庭(费孝通,2012)。因此,有些国家的普查报告将同居单列为一种新的居住类型。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一步步推迟结婚年龄、拉高离婚率、形成个体化社会的同时,也推进了各种类型同居率的上升。根据2018和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中国15岁以上单身人口已经增长到2.4亿左右,其中7700万属于独居人口。单身人口与独居人口的增加,不仅为中青年人口同居率的上升提供了社会支撑,而且推高了

<sup>①</sup> 在传统社会,“家”与“户”的区别不大。“户”本身是“一扇门”内的“人家”。封建社会政府部门统计的劳役、徭役与税负等,经常以“户”中“口”计。所谓“门当户对”,是指“对等”的家庭社会地位。但在工业化和现代化促进人口流动的背景下,住在“户”内的人口不一定完全属于家的范畴。这使“家”与“户”产生了很强的分疏性。

老年人口的同居概率。因此,在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对老年人口同居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同居属于“户”的属性,因为在血亲和姻亲关系约束下,如果将“吃”“住”“财”三者均作为变量考虑,则“同吃”“同住”“同财”就具有了“利他主义”原则的家的属性。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疏离了就业区位与居住区位的同构性。改革开放前,在单位制约约束下,定居化社会容易形成“同吃”和“同住”的关系,但工业社会消解了农业社会的“同财”基础,并以劳动者个人为单位分配收入,使其具有更多收入支配权<sup>①</sup>。改革开放后,人口流动、所有制形式的多元化、收入分配方式的市场化、财产来源的复杂化等,使家庭成员难以做到完全“同财”。现代化的推进、社会分工的细化、单位食堂的举办或就业单位以伙食补助所确定的定点消费,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一般意义上的“同吃”关系。但“同住”则被继承下来,并以《婚姻法》约束姻亲关系和血亲关系,形成具有法律约束意义的角色义务和权力关系。当然,两地分居与周末夫妻约会家庭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同住”的结构基础。因此,有些人将“同居”视为“家庭”分析其关系。然而,非血亲和非姻亲关系社会成员之间的组合,即使存在“同吃”和“同住”现象,也不能与姻亲关系和血亲关系的“家庭”相提并论。正如费孝通所言,家庭“是个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社群”,亲子形成家的结构,生育满足家绵延的基本功能。如果同居不能满足亲子结构与生育的合法功能<sup>②</sup>,则在人口统计意义上,以“户”的属性去理解<sup>③</sup>基本能够为社会成员所接受。从现有文献看,学术界对“同居”的研究绝大多数集中在“婚前同居”上。在有关家庭研究中,“婚外同居”经常隐蔽在陌生人社会之中。毕竟未解除婚姻关系而发生的“婚外同居”,经常会衍生为“重婚”等违法行为。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推进,东、西方社会均出现了多种形式的“老年同居”现象。现代社会存在数量众多的老年离婚者和老年丧偶者。老年离婚人口和老年丧偶人口的增加,

① 农业社会基于边界明确的地域及气候特征,形成自然再生产和人类社会再生产相结合的耕作模式,通过集体合作维持人类生存。在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生产安排中,家庭成员通过集体分工协作、共同有序完成生产过程,故具有“同财”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基础。

② 如果有关保护同居的法律被通过,并被赋予生育功能与养育功能,则家庭即可分为婚姻家庭和非婚家庭。比如,北欧国家的同居率很高,非婚生育占比接近50%。因此,家庭与同居的概念都伴随现代化而不断建构。

③ 一般将由姻亲关系和血亲关系而形成的、在一个较长历史时期共同居住和共同用餐的、具有代际分层结构的生活共同体称为家(Family)。以家为基础向外扩展而形成的、包括了非姻亲关系和非血亲关系的生活共同体称为户(Household)。因此,户的外延关系大于家的外延关系。在户内有家,但户并不必然形成家。在传统社会,人们主要生活在家中。现代社会文化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变迁,使生活在“户”中的人口趋于增多。人口普查意义的“户”中,既包括家这样的户,也包括以家为基础又涵盖了其他人的户,还包括了不具备家庭关系的社会成员所组成的户。

意味着老年单身者的增加。如果老年再婚行为受限于各种主客观因素,如成年子女的反,老年人可能会主动或被动选择同居。某些在青年或成年时期选择单身的人,到了老年阶段,为减轻生活压力、缓解孤独感,也可能选择“同居”。

虽然老年同居现象层出不穷,但学术界对老年“同居”行为的研究非常少见。因此,本文在一般意义上将各种类型的男女之间的“同居”视为“户”,并以此为出发点分析“老年同居”现象。

### 一、老年同居的概念界定与研究假设

在现代化过程中,随着异质性与宽容度的提升,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认可老年人在丧偶或离异后再度“恋爱”的能力与权力。一个社会对老年人恋爱伦理和性伦理越宽松,单身老人选择同居的可能性越大。

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中,丧偶者占30.4%,其中,女性老年人口的丧偶比例为41.7%,男性老年人口为18.5%(谭琳等,2004)。2010年全国人口数据普查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丧偶人口总数达4747.9万,占26.9%;未婚老人为313.7万,占1.8%;离婚老人为138.08万,占0.78%(孙鹃娟,2015)。随着社会保险覆盖率的提升和老年人健康状况的改善,虽然丧偶老年人口的占比下降,但因老年人口总数的上升,丧偶老年人口的总数也趋于上升。再加上一直处于增加态势的离婚老年人口和处于单身状态的“未婚”老年人口,发生“同居”行为的人口基数可能会越来越大。这在客观上使调查中存在的老年“同居”数量日渐攀升。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逐步提升,在迅速延长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同时,也提升了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健康预期寿命。1981年中国出生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仅为67.7岁,2019年已提高到77.3岁,上升了10岁。另外,老年人口经济供养来源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养老保险的不断增长,也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其生活自主性,增强了单身老人与其子女讨价还价的能力。人口流动与人户分离现象,使单身老年父母与子女一起居住的概率降低,这为老年同居创造了社会条件。所以,从社会发展的视角研究老年同居问题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未来老年人口生活共同体的重要增量也应该在“同居”上。

#### (一) 同居定义与研究对象的确定

如果将同居视为“户”,则在有关“同居”研究中,有“非婚同居”“婚外同居”“婚前同居”等类型。未经结婚的成年男性和女性持续居住生活在一起的社会现象,属于“非婚同居”<sup>①</sup>。已婚一方与未婚一方持续居住生活在一起,或者成年男性和女性双方都已结婚,但仍然公开或非公开居住在一起的社会现象,称为“婚外同居”。在结婚前,成年男性和成年女

<sup>①</sup> 本研究不涉及同性恋问题。

性居住在一起,但没有领取结婚证或举行婚礼的社会现象称为“婚前同居”。婚前同居包括在未婚同居中。成年男性和女性不是持续居住在一起,但在需要的时候会与相对固定的伴侣一起生活的社会现象称为“约会同居”。“同居”成立的几个必要条件是:(1)在被社会定义的时间段,成年男性和成年女性形成公开或非公开的、相对固定的居住生活关系。(2)持续地维持着这种共同居住的生活。(3)没有形成因为血亲和姻亲关系的扩延而带来的亲属或亲戚关系<sup>①</sup>。(4)形成了包含“性生活”内容的社会关系。在中国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过程中,社会意识形态改变了传统社会的性伦理和性道德,建立了更为包容的、适应时代发展的、与工业化后期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的生活伦理与性道德,发展出多种形式的老年同居现象,如“搭伙同居”(姜向群,2004;谭琳等,2004)、“走婚同居”(罗杰、尹鸽,2019)等<sup>②</sup>。

本文将年龄在 60 周岁及以上处于“单身”状态的、男女双方都没有形成婚姻关系、但持续公开居住生活在一起的共同体,定义为“户”意义的“老年同居”。也就是说,这里的研究对象是:(1)老年男性和老年女性之间的同居关系;(2)双方均与其他人不存在习惯法和成文法所认可的婚姻关系;(3)双方在一定时期内共同生活(无论是否发生性关系)。因此,这里只研究处于单身状态的老年人发生的同居问题,即只研究丧偶、离婚和从未结婚的老年人两性之间的同居问题。

## (二)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于 2019 年进行的“老年服务需求调查”。该调查在辽宁、河北、山东、上海、河南、广东、四川、陕西 8 个省份抽取了 80 个样本区(县)、800 个行政村(社区)共 8 116 个老年样本。在行政村和城市社区一级,考虑到老年人口不同年龄段的结构变化,扩大了 8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抽样比,在 60~69 岁年龄段抽取 7 人,70~79 岁年龄段抽取 5 人,80 岁及以上年龄段抽取 3 人。由于要照顾到男性和女性的不同需求,抽样扩大了男性在高年龄段的抽样比。该数据详细记录了个案的年龄、性别、身体状况、受教育程度、居家状况、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信息。在居家状况变量中,登记了在婚、离婚、同居、丧偶、单身等信息,可以用来分析“老年同居”问题。在采集到的 8 116 个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个案中,离婚、丧偶或单身的老人 2 280 个,其中 682 位被访老年人处于同居状态,1 378 个老年人丧偶,有 84 位老年人离婚,另有 139 位老年人“从未结婚”。因此,在目前单身的老年人中,同居比例达到 29.9%。详细信息如表 1 所示。

① 这里不研究同性之间的同居问题。因为同居关系的复杂性,这里也不涉及“非法同居”问题,如果同居双方中任何一方与他人保持事实婚姻关系,则本研究将此类案例排除在外,以化简研究。

② 严格意义上,这类同居不能视为人类学意义的“走婚”,而应该视为“间歇性同居”,即在双方认为必要时才居住在一起。



表1 调查样本(单身老人)的描述性统计

项 目	频次	百分比	项 目	频次	百分比
户籍类型			从未结婚	139	6.1
非农户籍	440	19.3	受教育程度		
农业户籍	1840	80.7	未上过学	831	36.4
性别			小学私塾	929	40.7
男	1078	47.2	初中	374	16.4
女	1205	52.8	高中及以上	147	6.4
年龄(岁)			月收入五等分组		
60~69	598	26.3	最低 20%	437	20.1
70~79	751	33.0	中低 20%	434	19.9
80~89	811	35.6	中等 20%	428	19.7
90岁及以上	117	5.1	中上 20%	444	20.4
当前生活状况			最高 20%	435	20.0
同居	682	29.9	是否需要照料		
丧偶	1378	60.4	需要	898	39.4
离婚	84	3.7	不需要	1379	60.6

(三) 研究假设

在“同居”研究中,青年人和成年人的“同居”,一方面取决于其婚姻道德与性伦理态度,另一方面取决于其收入水平(张亮,2020)。从调查数据看,在发达国家,婚前同居率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比如,利用美国全国家庭成长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Growth)数据,研究者观察到美国 19~44 岁

的女性有过同居经历的比例从 1987 年的 33% 上升到 2010 年的 60%,而中国在 2014 年男女双方自报的初婚前同居发生率分别为 10.54% 和 10.07%(於嘉、谢宇,2017)。除婚前同居外,“婚外同居”现象也屡见不鲜。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人口流动,以及由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所带来的收入的增加,提升了婚外同居的可能性。例如,农民工中的“临时夫妻”现象,就是典型的婚外同居(刘然,2017;丽华,2013)。从乡村进入城市后社会环境的变化,如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也消解了来自社会的“监督”压力,使之易于形成“同居”关系。不管是“婚前同居”还是“婚外同居”,都需要一定经济实力的支持。群租房现象的出现,也为男女两性的同居提供了方便(“群租”本身并不构成这里所定义的“同居”)。另外,在“租不起房”的男女之间,只能形成“定期”或“不定期”的约会,却难以形成“同居”格局。当然,经济实力也是非法包养关系形成的必然基础。所以,成年人口中异性之间的同居,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情感因素、性需求和收入水平会直接影响成年人的同居选择。收入水平越高,同居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大。

然而,老年人的同居,绝大多数是在熟人社会中。因为老年人“变老”的过程是社会活动范围和社会流动范围逐步受限的过程。健康程度与收入水平的降低,使其难以离开故土而迁移他乡。城镇化强力拉动其子女(劳动力)从乡村向城镇和城市流动,从而产生无数的“空壳化”村庄与“空巢家庭”。由于城镇生活成本较高,作为流动劳动力的成年子女难以将其老年父母接入城市,而更可能会将学龄子女携带到城市以接受较高质量的教育。这就使绝大多数农村呈现严重的老龄化现象。在传统社会,老年人的养老主要依靠成年已婚儿子和儿媳。“养儿防老”是定居化社会的主要制度安排。但老龄化与城镇化

的结合,使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难以依靠子女养老。配偶之间的养老已经成为主流模式。如果丧偶,则转化为“单身家庭”(张翼,2013)。子女进城务工经商,可以为老年父母提供经济支持,但难以提供家务供养和精神慰藉等资源。于是,单身老人或老年丧偶之后的孤独感,容易产生“搭伙”生活的“老年同居”现象。

对于城市来说,日益攀升的房价,或者用于出租的房产收入等,提升了家产的货币现值。如果单身老人再婚,就会发生家产处置矛盾。这种矛盾不仅发生在再婚的双方之间,而且会波及再婚双方和各自的子女,造成家庭内部血亲关系和姻亲关系的紧张,严重损害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赡养关系,形成复杂的财产继承矛盾(孟亚生,2011)。在城镇,为避免老年再婚所引起的亲缘冲突,不管是子女还是单身老人,大多会选择同居以化简矛盾。因为同居具有“好合好散”的性质,既不用领证、也不用转户口,更不会涉及“同财”等问题。所以,那些不打算“结婚”的单身老人,为克服晚年远离子女的孤独感,偏好以同居的方式生活在一起。城镇社会的异质化,老年人与子女居住区位的分离,以及老年人与子女见面次数的减少等,也增加了单身老人同居的可能性。因此,要回答为什么老年人偏好同居而很少选择再婚就必须考虑以下几点:(1)再婚确立的是“家庭”关系,同居确立的是“户”关系。再婚之后的角色,除形成“夫”“妻”等权利义务关系外,还会将家庭角色关系波及双方各自的成年子女,形成“继父”或“继母”等称谓,进而涉及孙子女与外孙子女之间的亲缘关系角色定位和由此所引起的权力关系问题。(2)再婚会涉及财产分割、遗产分配和赡养关系等问题。(3)再婚之后如双方关系破裂,必须经过离婚程序才能终结其权利和义务,但同居可自行随时终止。也就是说,同居既可以维持长期的“户”生活关系,也可以形成临时性的“户”生活关系。因此,单身老人为达到搭伙养老的目的,一般会选择同居而非再婚。

然而,收入水平较高的老年人,可能并不愿意形成同居格局。一方面,收入越高越怕同居过程引发财产争议。另一方面,如果收入完全有保障,则可能会选择以聘用“保姆”的方式养老,既解决“单身”之后的孤独,也解决家庭劳务负担,还可能会雇佣一个身体比较健康的陪护人员。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收入对单身老人的同居产生影响,收入较低的老年人在单身之后选择同居的可能性更大。同时,老年“父亲”或老年“母亲”的子女性别结构和数量,一方面形成养老资源,另一方面影响老年人单身之后的同居选择。老年父亲的成年儿子数量越多,单身后越易于发生同居行为;老年母亲的成年女儿数量越多,其单身后的同居发生概率越低。由于存在经济地位的区位差异,与城市的女性单身老人相比,农村单身女性老年人选择同居的概率可能会更高。

## 二、经济收入与同居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是理解基层社会“家”和“户”结构变迁的主要

根据。改革开放之前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农村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管理模式。在社会流动深受户籍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定居化所形成的人口管理模式、家族式村庄,以及婚姻嫁娶中遵循的“从夫父居”制度,构成熟人社会的基础。集体化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分配方式,基本上控制了家庭私有财富的增长。按 2010 年中国政府确定的贫困线标准,改革开放之初的 1978 年,97.5%的农村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sup>①</sup>。在一个家庭中,老年人口越多,子女越多,劳动力越少,则贫困程度越严重。在城市社会,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影响下,城市人口以街居制为基础,实行“单位制”意义的生产安排和生活福利分配。不管是“街居制”下的街坊邻居,还是“工厂制”所形成的家属院,都不断造就熟人社会和单位直接管理的集体主义居住模式。因此,不论农村还是城市,计划经济在高度组织化过程中,形成了与再分配经济相联系的、基于熟人社会的家庭与婚姻制度。由于人均预期寿命较短,60 岁及以上老年人数量较少,人均住房面积狭小,家庭成员居住拥挤,老年父母与成年已婚子女不得不居住在“同一屋檐下”,很难形成老年丧偶或离异之后的同居环境。即使是年轻人,也因为高度组织化的社区管理,以及对“资产阶级不良生活作风”的批判,使其很少有机会“婚前同居”。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转型为乡或镇,集体化生产组织方式转变为家庭化生产组织方式,僵硬的管控型户籍制度逐步放松,城市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旺盛,务工经商收入远高于种植收入,这些因素拉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另外,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扩大了家庭人均住房面积,据统计 2018 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扩大到 39 平方米(比 1978 年增加 32.3 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扩大到 47.3 平方米(比 1978 年增加 39.2 平方米)。住房面积的扩大,户规模的变小,进入老年阶段后男性和女性存活人数的增加,以及丧偶、离婚、单身老年人口总数的增加,为其在单身之后的同居行为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从表 2 可以看出,单身老人的同居行为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年龄和教育对同居行为不存在显著影响。如表 2 所示,“年龄”变量在模型中不显著。虽然在实际调查中,有些村落干部或社区工作人员认为年轻的独身老人(60~69 岁)更易于同居,但在数据分析中得不到验证。同时,座谈中某些社区工作人员认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老人更易于接受新思想、形成新观念、更愿意选择同居的生活方式,但在模型中,“受教育程度”这个变量也不显著。对于老年群体来说,在其单身之后的同居行为,可能包含着更为复杂的因果关系。毕竟现在的老年人口在其幼年和青年时期,因为教育资源的短缺,绝大多数没有接受过较好教育,只有少数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在社会伦理与老年人自己搭伙过日子心理影响下,不管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还是

<sup>①</sup> 数据来自 2019 年《中国统计年鉴》。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在“再婚”受限的情况下,对同居的选择偏好可能是无差异的。

第二,照顾需求是老年单身群体选择同居的显著影响因素。表 2 中,与不需要照料的对照组相比,“需要照料”者同居的发生比为 1.444。老年人的照料选择主要有三类:一是经济支持;二是精神慰藉;三是家务帮助。两个单身的老人同居,“精神慰藉”和“家庭劳务帮助”的需求更重要。当前的社会保险覆盖率越高,即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保障程度越高,搭伙过日子的可能性越大。老年居住社区的空心化程度越高,老年人会感觉越孤独。在这种情况下,“精神慰藉”可以化解老年人的孤独感。人在逐步老化的过程中,慢性病的得病率也会提高,身体不适会经常发生,同居老人的互相关照需求比较迫切,因此,需要照料是老年同居行为发生的重要原因。

第三,收入较低的老年群体同居可能性较高。在表 2 的“月收入”中可以看出,与对照组“最高 20%”相比,“最低 20%”同居的发生比为 1.879,“中间偏下 20%”的发生比为 1.995,“中间 20%”的发生比为 1.630,“中间偏上 20%”的发生比为 1.633。这说明较低收入组独身老人的同居发生比比对照组高出很多。在这里需要讨论的是:没有劳动能力和没有经济收入的单身老人,肯定难以找到同居的伴侣。但在有经济收入的单身老人中,收入较低的老年人易于同居。男女双方的收入都不多,或者这些收入仅能维持当前的生存状况,为了减少两处开灶的花费,同居一室,既可相互照顾,也可以省去一些不必要的花费(如水电费和物业费等)。在城市,如果各自住一套房,则不产生任何额外收益。如果长期同居,还可以将空出的一套房租出租。所以,同居型的搭伙养老,在单身老年人尤其是收入较低的单身老年人中,易产生“双赢”结果。

第四,儿子越多,同居可能性越高。表 2 中儿子数量对应的发生比为 1.211,这说明随着成年儿子数量的增

表 2 老年人口同居的逻辑斯特回归结果(N=2283)

变 量	系数	标准误	显著性	发生比
性别(男性=1)	0.011	0.106	0.915	1.011
户籍(农业户籍=1)	0.230	0.188	0.220	1.258
年龄(90岁及以上)				
60~69岁	0.152	0.246	0.538	1.164
70~79岁	-0.117	0.231	0.612	0.889
80~89岁	-0.224	0.220	0.308	0.799
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上)				
文盲或扫盲班	-0.242	0.246	0.326	0.785
小学毕业	-0.262	0.237	0.268	0.769
初中毕业	-0.030	0.246	0.904	0.971
是否需要照料(需要=1)	0.367	0.106	0.001	1.444
月收入(最高 20%)				
最低 20%	0.631	0.207	0.002	1.879
中间偏下 20%	0.691	0.210	0.001	1.995
中间 20%	0.489	0.209	0.021	1.630
中间偏上 20%	0.491	0.204	0.016	1.633
儿子数量	0.192	0.043	0.000	1.211
女儿数量	-0.057	0.042	0.173	0.944
常数	-1.694	0.332	0.000	0.184
-2 对数似然值	2499.39			

注:括号内为参照组。



加,单身后同居的可能性会趋于上升。在传统社会,成年儿子与儿媳是养老的主要资源。对有多个儿子的老人来说,通过“分家安排”留下一部分土地、院落或房屋等养老资源,作为供养自己的儿子的财产补充。在农业社会中,土地和院落是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在现代社会,工业化解构了原有的生产与再生产结构。进城务工经商收入远高于种地收入。农村的宅院价值远低于县城或其他城市的住房。谁来养老人需要经过家庭成员共同协商。于是,契约性的养老安排代替了农业社会的制度性安排。成年儿子可以出钱,但不愿与老年父母生活在一起。因此,经常观察到的现象是:老年父母居住在“老宅”,成年儿子们各自生活在自己家的“新宅”。在老年父母生活不能自理时,“轮养”已成为惯用的契约安排。在城市社区,人户分离现象越来越普遍。独生子女结婚之日,就是其与父母亲分居之时。为避免家庭矛盾,婆婆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符号化概念,失去了代际权力的支配含义。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成年儿子们可能会按照契约提供经济支持,但难以居住在一起形成家庭供养关系。于是,儿子们越多,越会“尊重”老年父亲单身后的生活意愿,鼓励或听任老年父亲单身之后选择同居。在访谈中,经常会听到“总得有个伴儿,有个伴儿总比没有人照顾强”。但前提是不能结婚。有些人怕结婚被骗,导致财产损失,有些人怕父亲再婚给子女带来新的养老压力。因此,老年人的同居逐渐转变为一种无奈的选择。

### 三、两性差异与同居选择

在老年同居行为中,男性和女性的选择偏好是否一样,男性和女性选择同居的原因是否一致,既定的社会存在影响着个体的社会行动。

第一,在农村社会,家族势力仍然具有一定影响。如果女性老人在丈夫去世后要找个同居伴侣,则很难将这个同居伴侣带到原丈夫的村庄居住。但如果离开村庄而迁居到其他地方,如迁居到城镇或县城,或者男方的村落,即到同居伙伴的家里去居住,会相对容易一些,不用忍受家族内部或原来村庄内部的“闲言碎语”。只要自己能够自立生活,子女已成年或已独立、不存在“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压力,男方及其家人就容易接受这种同居安排。从表3可以看出,在“老年单身男性”模型中,“户籍”变量不显著,但在“老年单身女性”模型中,“户籍”变量却极其显著,农业户籍的单身老人比非农户籍的单身老人同居的发生比高1.182倍。对于农村丧偶的女性老人来说,单身之后发生同居行为的概率要高很多(农村离异的发生比并不高)。城市老人的生活条件相对比较优厚,其预期寿命较长,丧偶率较低,因此,在丧偶后同居发生率要低很多。但对于农村户籍的单身老年女性而言,其既可以与农村户口的男性、也可以与城镇户口的男性发生同居行为。这就增加了农业户籍老年单身女性同居的选择机会。

第二,收入较低的老年单身男性同居的可能性更大。在表3“老年单身男性”模型中,与“最高20%”相比,“最低20%”同居的发生比为2.129,“中间偏下20%”的发生比为2.653,“中间20%”的发生比为1.731。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需要照顾”的男性比不需要照顾的男性“同居”发生比更高。但在“老年单身女性”模型中,与其他收入组别相比,仅收入最低的组较易发生同居行为,而“需要照顾”变量并不显著。在男性和女性的家庭分工中,在劳动就业时段形成的“男主外女主内”格局,在老年阶段仍然延续。在女性单身且需要照顾的情况下,其很难找到同居伙伴,但男性更有可能找到。其原因,一方面,受“生存法则”的影响,即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女性的丧偶率远大于老年男性,出现老年

表3 分性别的老年同居回归结果

变 量	老年单身男性			老年单身女性		
	系数	标准误	幂值	系数	标准误	幂值
户籍(农业户籍=1)	-0.180	0.268	0.836	0.780	0.281	2.182**
年龄(90岁及以上)						
60~69岁	0.406	0.374	1.500	-0.018	0.343	0.982
70~79岁	0.276	0.349	1.317	-0.473	0.323	0.623
80~89岁	0.047	0.325	1.048	-0.464	0.311	0.629
受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上)						
文盲或扫盲班	-0.246	0.339	0.782	-0.093	0.388	0.911
小学毕业	-0.261	0.313	0.770	-0.259	0.384	0.772
初中毕业	0.012	0.329	1.012	0.022	0.388	1.022
是否需要照料(需要=1)	0.428	0.162	1.534***	0.249	0.148	1.283
月收入(最高20%组)						
最低20%	0.756	0.307	2.129***	0.527	0.299	1.694**
中间偏下20%	0.976	0.303	2.653***	0.411	0.310	1.508
中间20%	0.549	0.304	1.731*	0.499	0.308	1.647
中间偏上20%	0.436	0.290	1.546	0.677	0.302	1.567
儿子数量	0.324	0.067	1.383***	0.024	0.061	1.024
女儿数量	0.078	0.064	1.081	-0.194	0.059	0.824***
对养老金满意程度(不满意)						
满意	0.283	0.264	1.326	0.089	0.182	1.093
一般	-0.141	0.238	0.869	-0.478	0.242	0.620**
对医疗满意程度(不满意)						
满意	-0.332	0.376	0.717	0.226	0.179	1.254
一般	0.123	0.350	1.131	0.326	0.352	1.385
常量	-2.078	0.57	0.125	-1.408	0.471	0.245***
样本量		1078			1128	
-2对数似然值		1163.18			1306.68	

注:括号内为参照组。\*表示 $p<0.05$ ,\*\*表示 $p<0.01$ ,\*\*\*表示 $p<0.001$ 。

男性单身人口较少,而老年女性单身人口较多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女性的独立生活能力强于男性,一般经济收入较高的女性不愿为“照料”同居男性伙伴而选择同居。

第三,男性和女性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均不显著。这与前面讨论一致,对于老年人而言,在社会巨变过程中,化解日常生活的困难可能才是同居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

第四,子女的性别结构与数量,对单身父亲或母亲的同居选择具有不同的影响。在“老年单身男性”模型中,成年儿子数量越多越会增加老年人的同居概率。但成年女儿数量却不显著。在表3老年单身男性模型中,每增加1个成年儿子,单身老年人的同居发生比会增加0.383倍。但在“老年单身女性”模型中,成年儿子数量不显著,但成年女儿数量的增多,会降低老年单身女性的同居概率。比如,每增加1个成年女儿,其同居的发生比会降低0.176倍。这是一个非常吊诡的现象。作为集合变量,儿子多会增加单身父亲的同居概率,而女儿多则会降低母亲的同居概率。因为农村地区出嫁的女儿要转走户口,并随之失去集体经济收益的分配权和承包地的承包权,也会失去家产继承权和家庭财产收益的分配权。当然,与此相对应的是,在有成年儿子的家庭,出嫁的女儿也被免除了其对老年父母的赡养责任与义务,女儿只是作为“亲戚”在尽孝尽力。虽然城市社会在男女平等方面取得重大进步,但部分老年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传男不传女”的想法。因此,非经争取,儿子分到的家产会多于女儿。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出嫁的女儿不会强烈干预父母单身之后的生活。

#### 四、结论与讨论

老年同居是一个“现代性”的社会现象,刚开始会被“问题化”,但在作为一种非家庭的户安排生活方式,会逐渐被社会所接受。老年同居现象,不仅在城市成为老年单身生活安排的共同体结构,而且也在农村成为老年单身之后的养老安排。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老年同居不同于年轻人同居。无论是婚前同居还是婚外同居,对于年轻人来说,都以较高的经济收入为支撑。不难理解,对男性而言,收入越高,其越易于在求偶市场发现同居对象。对女性而言,收入越高也越能吸引异性的目光。如果没有收入的支持,就很难发生同居行为。在城市房价和房租同步提升的背景下,收入就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但对老年单身人口而言,同居是丧偶或离异之后的一种被动选择。因为不以结婚为目标,也因为同居安排在自有的房产与熟人社会之中,故收入较低的老年人才会选择同居模式。收入越高,老年人牵扯到的财产分配问题越复杂,老年人的子女越担心同居会发展为婚姻,于是会联合起来反对单身父亲或母亲的同居。

第二,无论老年男性还是老年女性,如果没有感情基础的支持,同居的时间不会持

续太长。同居不是婚姻,同居中双方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缺少社会伦理和法律的明确约束。对于独身的老年人而言,同居行为易于发生,只要子女不反对,则根据老年人自己的意愿,相对容易达成。但变老的过程,是生活自理能力逐渐消退的过程,也是日常生活与经济支持依赖程度逐渐提高的过程。另外,老年同居的双方,各自都可能有过婚姻经历,也形成了对配偶的刻板印象。即使是未婚者,也可能经历过与其他人的恋爱过程和多次同居过程。这就使其形成了固有的“对象需求印象”。一旦发生矛盾,“同居”往往会终止。因此,与成年人的同居相似,老年同居现象,往往是一个过程性现象,而甚少与某个具体的同居对象将同居生活持续到生命的终点。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老年单身者来说,“同居”很难走向“婚姻”。由于老年单身男性少于老年单身女性,所以,老年单身男性有更多选择机会,年龄越大,男性越少,女性越多,这就很难使“老年同居”保持长期而稳定的关系。

第三,子女对单身老年人的生活,会产生决定性影响。毕竟,在生活自理能力逐渐下降过程中,“同居”所形成的“户”结构很难产生“同居”意义的赡养关系。作为过程事件的“同居”关系一旦解体,搭伙养老的结构将不复存在,老年人还要依靠自己的子女养老送终。但为什么成年儿子较多的父亲易于选择同居?而成年女儿较多的母亲较少选择同居?是城镇化的进行增加了年轻女性的家庭决策权吗?是老年单身女性的女儿愿意将母亲接到自己的家中照料吗?是老年女性的家务劳动更易于赢得女儿家庭的欢迎吗?是姻亲关系的强度逐渐大于血亲关系的强度了吗?不同的案例,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但需要着重考虑的是:城镇化过程解构了农业社会“从夫”与“从夫父”的居住模式,而强化了姻亲关系的联络纽带,在城市社会形成了越来越多的与岳父母同住的主干家庭。在岳父去世之后,岳母与女儿的同住,既可以减轻上班工作的女儿、女婿的家务负担,也可以接送外孙放学上学。应该说,女性老人的环境适应能力,与子女的协调交流能力,以及在家务劳动中的适应能力等都强于男性。成年女性家庭决策能力的增长,使姥姥带外孙的案例趋于增多,奶奶带孙子的案例趋于减少。老年母亲的女儿越多,女儿把自己的母亲接到家中过日子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降低此种类型老年单身女性的同居概率。

第四,老年单身男性越需要照料,越易于发生同居行为。老年单身女性只是在经济收入较低时,才发生同居行为。男性在变老的过程中,很容易丧失原有的社会网络而转变为孤独的生活者。但受女性预期寿命与健康预期寿命均长于男性的影响,女性晚年的自我照料能力强于男性。当然,社会性别的刻板印象,也在同居安排中易于形成“女到男家”的制度配置。所以,在“老年同居”这样的生活共同体之中,大多数老年男性得到的是“照料”,而大多数老年女性可能是“照料”的提供者。



第五,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升和社会保险覆盖范围的扩大与支持力度的加强,在老年离异与老年丧偶之后,单身老年人的同居概率会提高。这就是说,除家庭作为老年生活的共同体之外,同居所形成的户类型的生活共同体还会增多。在西方发达国家,伴随成年劳动力人口结婚率的下降与同居率的上升,老年退休人员中的同居概率也趋于增长。中国当前正在推进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除提升人们的物质生活质量外,还将深层改变整个社会的群体组织生活方式和“家”“户”结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老年同居问题的研究才具有“新社会结构生长点”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当然,老年群体是经历生命历程选择之后的存活群体,一部分人因各种疾病或灾难去世了。所以,这里研究的老居行为,只是存活老年人口中单身者的同居行为。在老年丧偶率远高于老年离异率的情况下,老年同居的双方,大多数是在丧偶的情况下发生的。在现代化强化了整个老年人口的健康程度并提升各个年龄段人口的存活率之后,老年单身人口的“单身”原因构成中,将会增加离异案例的份额。从西方发达国家可以看出,随着青年离婚率的上升,中年离婚率也会提高,整个社会不婚率与离异率的上升将使老年单身问题更加显化。在人均寿命的延长过程中,有过离婚史或没有婚史的单身老人同居发生率会提高。生活方式的多元化还会继续丰富老年同居研究的内容。

####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2012):《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
2. 姜向群(2004):《“搭伙养老”现象与老年人再婚难问题》,《人口研究》,第3期。
3. 罗杰、尹鸽(2019):《“走婚同居”养老的法律问题的研究》,《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4. 刘然(2017):《从刑法角度分析“临时夫妻”现象》,《法制与社会》,第2期。
5. 丽华(2013):《游走在伦理和法律边缘的农民工“临时夫妻”》,《中国工人》,第9期。
6. 孟亚生(2011):《老年再婚:是“馅饼”还是“陷阱”》,《学习月刊》,第19期。
7. 孙鹃娟(2015):《中国老年人的婚姻状况与变化趋势——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8. 王跃生(2016):《中国当代家庭、家户和家的“分”与“合”》,《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9. 於嘉、谢宇(2017):《我国居民初婚前同居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人口研究》,第2期。
10. 张鸿渐(2018):《老年再婚中的继承问题思考》,《法制博览》,第28期。
11. 张亮(2020):《从约会到同居:“他的”和“她的”同居决策比较——基于“90后”流动青年同居者的质性研究》,《妇女研究论丛》,第2期。
12. 张翼(2013):《中国老年人口的家庭居住、健康与照料安排——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江苏社会科学》,第1期。

(责任编辑:朱 犁)